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一主编 王四代 张宗红 范例

佤族传统音乐研究

Studies in
National Art
of Yunnan



张宗红 〇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主编 王四代 张宗红 范例

佤族传统音乐研究

张宗红〇著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大学出版社

Studies in
National Art
of Yunn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佤族传统音乐研究 / 张宗红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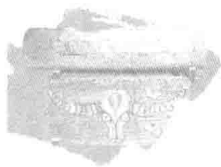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

ISBN 978-7-5482-2275-0

I. ①佤… II. ①张… III. ①佤族—民族音乐—研究—中国 IV. ①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5711号

策划编辑: 邓立木 / 责任编辑: 严永欢 / 装帧设计: 贺 涛



佤族传统音乐研究

张宗红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16千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275-0

定 价: 32.00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和少英

学术指导：马 戎 杨圣敏 王铭铭 彭兆荣 周 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四代 王子华 王明东 方 桢 刘劲荣

那金华 李国文 李若青 张宗红 杨宗亮

陈 斌 罗海麟 赵静冬 郭飞平 高登荣

黄彩文 韩忠太 雷 兵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H. R. Davies 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1979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5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36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0项,省部级课题50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2300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2013年7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俐侎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甸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以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学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遗产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摘要

佤族是中国、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的跨境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佤族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佤族传统音乐文化。根据演唱场所、演唱内容和文化功能的不同，参照西盟县翁嘎科乡一带对佤族传统民歌的称谓，可以把佤族传统民歌分为“楞”“让”“班叻”“算乱”和“赛”五类。佤族使用的乐器种类极为丰富，包含了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等。在这些乐器中，吹管乐器是佤族使用最多的一类乐器；独弦胡是佤族最具特色的一种拉弦乐器；铜鼓是佤族曾经使用，现在几乎绝迹的一种打击乐器；木鼓是佤族最神秘、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佤族传统音乐文化之所以一直在佤族的传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佤族传统音乐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社会文化功能。佤族传统音乐的优美旋律，不仅感动着生活在佤山的普通佤族人，同时还引起专业作曲家的关注，并在佤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创作出了《阿佤人民唱新歌》《月亮升起来》等经典音乐作品。在经济不发达、交通滞后的年代里，佤族传统音乐文化受外来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的影响较小，并不需要进行特别的保护与传承。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佤族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一方面佤族要依靠现代化提升本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佤族也希望保护



和传承好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但随着现代化在佤族地区的不断推进，这两种文化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出现了危机。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虽然佤族传统音乐文化还拥有相对稳定的文化圈、民间传承机制犹存、自我认同感强烈等对保护与传承有利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主流文化冲击强烈，部分习俗正在改变、佤族传统音乐文化价值观受到严峻挑战、民间艺人老化现象突出、后继乏人等不利因素。经过多年的调查和研究，笔者认为采用静态与活态相结合、政府与民间齐努力、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相结合、实行国际性的跨地区保护与传承等措施，是目前佤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可以采用的对策。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佤族传统民歌	14
第一节 佤族传统民歌的种类	14
第二节 佤族传统民歌的音乐特点	34
第三节 佤族传统民歌的文化解读	45
第二章 佤族传统器乐	53
第一节 佤族传统乐器的种类及构造	53
第二节 佤族传统乐器的特点	69
第三节 佤族传统乐器演奏的经典曲目	74
第四节 佤族传统乐器的文化内涵	84
第三章 佤族传统音乐的审美特征	90
第一节 佤族传统音乐的民间审美特征	90
第二节 佤族传统音乐的审美价值	93



第四章 运用佤族传统音乐元素进行创作的典型个案	96
第一节 《阿佤人民唱新歌》与佤族传统音乐	96
第二节 《月亮升起来》与佤族传统音乐	99
第三节 当代佤族民间艺人的创作	101
第五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佤族传统音乐	106
第一节 主流文化冲击力巨大	106
第二节 文化圈相对独立	108
第三节 娱人与娱神功能犹存	109
第四节 佤族传统音乐文化功能已有变迁	111
第五节 自我认同感强烈	113
第六章 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118
第一节 保护与传承现状	118
第二节 保护与传承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125
第三节 保护与传承建议	132
结 语	139
附录一 《田野调查日记》选	141
附录二 《佤族优秀音乐民间艺人小传》选	149
参考文献	158
后 记	160

绪 论

佤族是中国、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的跨境民族。云南境内的佤族主要分布在西盟、沧源两个佤族自治县，孟连、耿马、澜沧、双江、镇康、永德等县也有分布，国内总人口 429 709 人。^①大部分佤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与傣族杂居的部分佤族信仰南传佛教，还有少部分佤族信仰基督教。但无论信仰哪种宗教，音乐在佤族的生活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用音乐传播劳动知识、庆祝节日、表达爱情、祭祀亡灵，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使用音乐聊天、娱乐等。可以说，佤族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民族，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传统音乐。

一、关于佤族传统音乐的界定

关于“传统音乐”的概念，音乐学界特别是“中国音乐学术界亦有多种理解、多种解释”^②。董维松、樊祖荫、田联韬、杜亚雄、王耀华等民族音乐学家都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过界定。这些民族音乐学家在界定“中国传统音乐”时，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时限、分类等内容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他们在阐述过程中，都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是与现代音乐相对应的概念。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可分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四个部分；少部分学者在这四部分基础上有所延伸。例如，董维松先生认为：“有些品种可能还不能归到这四类中去，那么，就只好笼统称之为‘传统音乐’。这样，加起来就有‘五大类’。”^③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编著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一书中，把少数民族音乐归为“四域音乐”，也囊括在中国传统音乐之中。^④这些前辈学者对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不仅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笔者研究佤族传统音乐提供了

① [http://data.stats.gov.cn/search/keywordlist2;jsessionid=F3EF0F4A1C144C56E796E729E155755E?](http://data.stats.gov.cn/search/keywordlist2;jsessionid=F3EF0F4A1C144C56E796E729E155755E?keyword=2010) keyword=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情况。

② 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 页。

③ 董维松：《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分类问题》，《中国音乐》1987 年第 2 期。

④ 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25 页。



新的思路。

在研究佤族音乐的学者中，多数都以“佤族民间音乐”“佤族宗教音乐”等名称对佤族音乐进行阐述。以佤族传统音乐的名称对佤族音乐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见，田联韬、杨德厚在《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第二期上发表的《中国境内的佤族传统音乐考察研究》^①是比较规范的研究成果之一。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一直以“佤族民间音乐”的名称对从佤族地区收集来的佤族音乐进行陈述。但从中国传统音乐的概念来看，“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及“官方音乐”是相对应的概念，最早甚至是一种带有贬义的称谓。为了更好地研究佤族音乐，继续使用“佤族民间音乐”的概念显然有些不妥，应该使用一个相对科学的概念来界定佤族世代相传的音乐。鉴于前辈学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界定，在研究佤族音乐时，使用“佤族传统音乐”这一称谓应该还是比较科学的。在社会发展中，虽然佤族的社会形态相对单一，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佤族宫廷，也没有出现过佤族文人群体的现象，但佤族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在宗教仪式活动中，或多或少都会使用一些音乐。如果只使用佤族民间音乐的概念，就要把世代相传的种类丰富的佤族音乐阐述清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应该把世代相传的非专业作曲家创作的佤族音乐统称为佤族传统音乐。按中国传统音乐的概念标准，它应该包括佤族民间音乐、佤族宫廷音乐、佤族文人音乐和佤族宗教音乐四个部分。由于佤族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佤族宫廷和佤族文人群体的现象，所以佤族传统音乐中并没有佤族宫廷音乐和佤族文人音乐。事实上，佤族传统音乐只有佤族民间音乐和佤族宗教音乐两个部分，不包括过去和现在由他民族或本民族专业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虽然大部分佤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也在祭祀过程中使用音乐，但各地区的佤族在原始祭祀过程中使用的音乐大多是当地的某一个音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音乐。部分佤族受傣族的影响，信仰南传佛教，所以在宗教仪式过程中也基本上都是套用傣族音乐；还有少部分佤族信仰基督教，在宗教仪式过程中使用音乐时基本上也是套用西方基督教的音乐，这更不应该视为佤族宗教音乐。因此，佤族传统音乐虽然包含佤族民间音乐和佤族宗教音乐两个部分，但主要内容还是佤族民间音乐。

二、佤族传统音乐研究现状

佤族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功能各异的传统音乐，并代代相传。但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现代媒体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覆盖的地域也越来越广，就连地

^① 此文的大部分内容入编了田联韬主编，2001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的“佤族传统音乐”一章。

处中缅边境、交通和经济都相对滞后的阿佤山同样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了解外面的世界,接受外来文化,感受高科技带来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虽然给佤族带来了发展,但同时也让佤族传统音乐文化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外来音乐文化的包围之中,受到了外来文化特别是主流音乐文化的强烈冲击,致使佤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相对于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危机现状和较为丰富的内容来说,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前,研究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文献资料笔者未能查到。专业音乐学者收集研究佤族传统音乐大概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杨正仁先生曾经在佤族地区采录过一些佤族民歌,并于1972年以佤族民歌为素材创作了经典作品《阿瓦人民唱新歌》^①,让世人感受到了佤族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云南民间音乐集成项目开始实施,但一直未见成果出版。1999年,田联韬、杨德厚发表在《民族艺术研究》上的《中国境内佤族传统音乐考察与研究》^②是佤族传统音乐研究比较规范的研究成果。2001年10月,由田联韬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一书,把佤族传统音乐作为独立的章节进行了阐述,并把佤族传统音乐分为民间音乐与宗教音乐两大类。^③2002年3月,佤族作曲家李柏松编著的《佤族民歌》一书,收录了沧源、西盟等地的佤族民歌116首,并把佤族民歌大体分为山歌、唱调、玩调、劳动歌、风习歌、歌舞曲和儿歌共七种类型。^④2002年5月,杜亚雄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一书,对佤族民间音乐进行了阐述,把佤族民间音乐分为民歌、器乐和歌舞三种体裁形式。^⑤2003年10月,张兴荣编著的《云南特有民族原生音乐》一书,把佤族民间音乐划分为民歌、歌舞、器乐三种体裁形式。^⑥以上专业音乐学者是从音乐学角度研究佤族传统音乐的代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佤族传统音乐的声音和构造,是专业音乐学者研究佤族传统音乐非常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宣传佤族传统音乐、研究佤族传统音乐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除专业音乐学者从音乐学的角度研究佤族传统音乐外,也有许多非专业音乐学者特别是民族学学者也在佤族传统音乐研究方面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并影响着专业音乐学者不断地丰富着他们的研究视觉。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

① 参见《歌海》2002年第6期,第43页。《阿瓦人民唱新歌》的创作时间有很多版本,也有资料显示此曲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

② 田联韬、杨德厚:《中国境内佤族传统音乐考察与研究》,《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2页。

④ 李柏松:《佤族民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⑤ 杜亚雄编著:《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⑥ 张兴荣:《云南特有民族原生音乐》,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